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劳动力老化： 发展趋势、机理分析与应对路径

陆杰华 郭荣荣

[摘要] 农村劳动力作为乡村最具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大利益需求者,其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劳动力老化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增速均高于城镇,未来30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现年龄结构断层的发展轨迹,劳动力老化水平始终超出40%的临界值;在空间特征上呈现出非均衡分布的特点,存在区域和省际差异。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急速提升源于,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年龄选择性带来的农村大龄劳动力相对增多和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而这将逐渐打破原有的农业生产要素分配格局和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势必对农业经济活动和农村社会系统产生深层次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老化的路径选择,以提高乡村人力资本质量和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的主动性。

[关键词] 劳动力老化;乡村振兴;乡村人力资本

DOI:10.13240/j.cnki.caujss.20230918.01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极端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对农业农村工作进行了总体战略部署,特别强调到2035年,农村基本具备现代化条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①。乡村振兴战略本质上是要实现乡村地区人、地、业、财等多要素的综合振兴,其中人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郭远智等,2019)。面对当前已经出现的农村居住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口数量减少的“空心化”和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农村衰落现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之一,是注重优化乡村人口结构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提高乡村人力资本质量和激活农业主体生产要素,补齐农民现代化这个“人”的现代化短板(张强等,2018)。劳动力人口历来是社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有力保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20ZDA32)。

[作者简介] 陆杰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郭荣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①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

障,农村劳动力状况则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乡村治理的有效与否(叶兴庆,2018)。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来看,一方面,伴随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的缩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也在持续下降。2010—2020年,农村15~64岁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重从70.78%下降至63.01%,年平均下降达1.28%^①。另一方面,不断加深的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预示了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2010—2020年,全国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平均增速为6.5%,高于同期全国增速1.77个百分点。同时,受到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交互影响,农村45岁及以上大龄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整体处于上升态势,到2020年达到50.24%,该值已经超过40%的临界值^②。更值得关注的是,近10年该比重增速达3.83%,是全国劳动力老化增速的1.3倍,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老化日益严峻。

相比整体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经济社会对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的感知更为敏感(陆杰华,韦晓丹,2022)。农村劳动力老化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比人口老龄化更为直接和突出的影响,将会影响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农村地区劳动力特点及发展趋势,剖析劳动力老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农村发展的潜在影响,探讨积极有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老化的政策举措,是从农村已经普遍出现的老龄化、空心化的现实情况出发,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以解决“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转变为新时期以解决“转移后问题”的实践表现(张强等,2018)。现有文献对农村劳动力老化问题的研究呈现两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方面,贯穿于对15~64岁农村劳动力群体的研究中,聚焦劳动力的变动趋势、转移就业、回流治理等,将劳动力老化作为各自研究问题的驱动因素或约束条件。例如,有研究预计“十四五”期间农村劳动力占比将平均每年下降0.7个百分点,同时农村流出人口的年龄选择性使得流出人口平均年龄和老年人口比例都远低于农村人口整体水平,加速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谢玲红,2021)。另一方面,置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中,将45~64岁大龄劳动力占比增大作为老龄化进程加速的一个方面,探讨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乡村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乡村治理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已有研究指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不同程度地造成农业种植结构单一、阻碍农业技术进步,不利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亦会导致农村治理主体老化、政治参与度降低,不利于乡村社会稳定和

① 整理自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② 联合国国际劳动组织将劳动年龄人口中45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定义为大龄劳动力,劳动力老化表现为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中,大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上升的动态过程。劳动力老化水平等于45~6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假如劳动年龄人口在年龄上是均匀分布的,则该比重应为40%,超出40%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已呈现老化态势。

发展(廖柳文,高晓路,2018)。

以往研究对本研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但难以完全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优化乡村人力资本配置的新需求。一方面,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整体,缺乏对各年龄阶段劳动力的分层剖析,尤其缺乏对大龄劳动力的变动态势和区域差异的研究;另一方面,广泛着眼于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引发的各方面问题,较少关注劳动力老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潜在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首先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对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历时特征和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和预测,比较城乡、性别和区域差异;其次尝试搭建农村劳动力老化问题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以探究农村劳动力老化的驱动条件及其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层次影响;最后讨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老化,以优化乡村人口结构和最大化释放乡村人力资源潜力。

一、我国农村地区劳动力老化特点及发展趋势预测

(一)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历时特征:城乡、性别差异及趋势演变

1. 农村劳动力老化的绝对水平和相对增速均高于城镇,且呈加速增长态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劳动力老化水平达42.47%,并且20年间以0.76%的平均年增长率上升。2000—2020年城市、镇与乡村的劳动力老化水平及其增速状况表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性老化正日益严峻,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不仅高于全国劳动力老化平均水平,亦始终远高于同期的城市和镇。如表1所示,2000—2010年,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由28.93%上升至35.82%,劳动力老化增速为23.8%;镇以26.51%的最高增速水平,由24.46%增长至30.94%;城市的绝对比重和增速皆处于最低。2010—2020年,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则以40.25%的最高增速上升至50.24%,该水平分别高于镇和城市8.9和13.1个百分点,增速分别是镇和城市的1.2倍和1.47倍。这表明,如今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已有半数处于45岁及以上,且该比重在加速膨胀。

表1 中国2000—2020年城市、镇、乡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及增速状况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老化水平/%	老化水平/%	10年增速/%	老化水平/%	10年增速/%
城市	24.75	29.19	17.91	37.18	27.37
镇	24.46	30.94	26.51	41.32	33.54
乡村	28.93	35.82	23.80	50.24	40.25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五、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2. 全国劳动力老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尤其在农村差异最大

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水平同时显示出性别差异,女性在大龄劳动力中的比重在

全国、城市、镇和乡村水平上均高于男性。图 1 显示,2020 年全国女性劳动力老化水平为 43.28%,男性为 41.70%。与城市和镇相比,农村女性劳动力老化水平最高,比重达 51.91%,是城市的 1.37 倍;并且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性别差异最大,女性高于男性 3.18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老龄人口性别发展失衡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的性别差异亦存在客观规律性,尤以该年龄段中的农村女性老化水平发展较快。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生理状况以及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同,女性较男性而言存在明显的健康劣势,且会随生命周期的演进累积到老年期,对于缺乏医疗保障、经济供养、照护服务的农村女性大龄劳动力更是如此(刘二鹏,张奇林,2019)。将分性别视角纳入对农村劳动力老化的特征分析和趋势预测中,既符合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性别结构差异的客观事实,亦有利于深刻剖析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潜在影响和落实公共政策的性别主流化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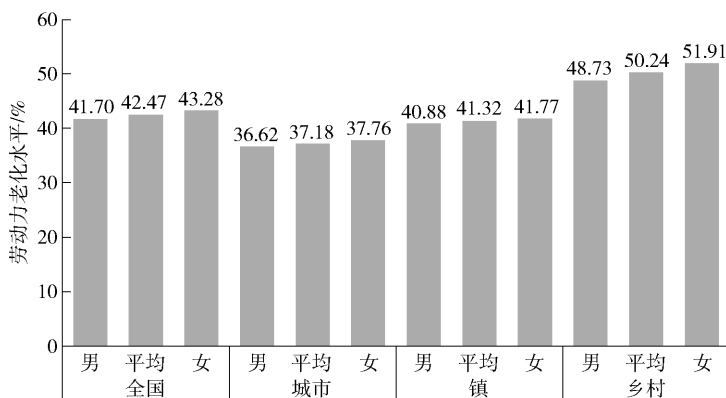


图 1 2020 年分性别全国、城市、镇、乡村劳动力老化水平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3. 未来 30 年农村劳动力老化还将进一步加剧,性别差异逐渐缩小

在现有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发展趋势下,根据预测模型^①,2020—2050 年农村劳动力老化趋势如图 2 所示。一方面,整体来看,在未来 25 年间,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始终超出 40% 这一临界值,并且有近 10 年维持在 50% 的高位水平,最高值将出现在 2026 年,达到 51.25%。具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 2020—2026 年的高位增长期,劳动力老化水平将以 0.17% 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波动增长,并始终维持在 50% 的高位水平。第二阶段是 2026—2043 年的缓慢下降期,大龄劳动力比重由峰值下降到 46.74%,年平均下降速度为 0.54%。第三阶段是 2043—2050 年的快速衰

① 本研究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多来源人口数据,基于队列要素预测原理,采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PADIS-INT 人口预测软件设置分城乡生育、死亡、迁移等预测参数,对我国分城乡人口变动趋势进行预测。

退期,到21世纪中叶,农村大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37.85%,年均降速达2.97%。该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自2048年后,4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低于40%。另一方面,分性别来看,农村女性劳动力老化水平始终高于男性和总体平均水平,但性别差异自2029年后将逐渐缩小。其一,女性劳动力老化水平有近15年维持在50%的水平,峰值将出现在2026年,达到53.48%,男性亦在该年达到49.28%的最高点。其二,未来30年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性别差异的均值为3.07%,女性高于男性的差值将在2029年达到最大值4.28%后逐渐缩小,直至2048年后将出现逆转,即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大龄劳动力所占比重将高于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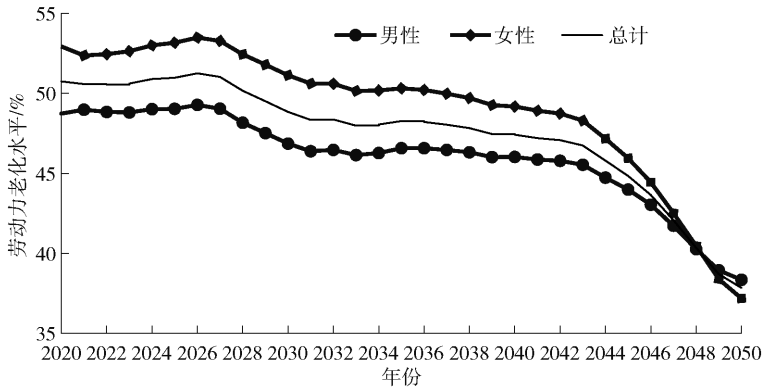


图2 2020—2050年分性别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趋势预测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多来源人口数据对我国分城乡人口变动趋势进行预测。

(二)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空间特征:区域与省际差异比较

虽然农村劳动力老化现象整体发展迅猛,但在不同地区和省份中发展态势并不一致。主要表现为:其一,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最低且内部差异最大。在四大经济分区中(见图3),东北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最高,不仅域内三个省份的老化水平均高于全国50.24%的均值,而且辽宁省的农村大龄劳动力所占比重以60.05%的水平位居全国第一。其次为中部地区,各省份的农村大龄劳动力占比均超出40%的临界值,且有超半数省份的比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均值分别为48.6%和46.4%,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域内有个别省份值低于40%,即农村劳动力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未出现明显的老化现象。在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间差异最大,12个省份中有5个省份的老化水平高于全国均值,同时在低于全国均值的7个省份中,有2个省份并未达到40%的临界值。

其二,各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呈左偏分布,最高与最低省份相差29个百分点。一方面,从偏态分布来看,31个省份的农村大龄劳动力所占比值分布较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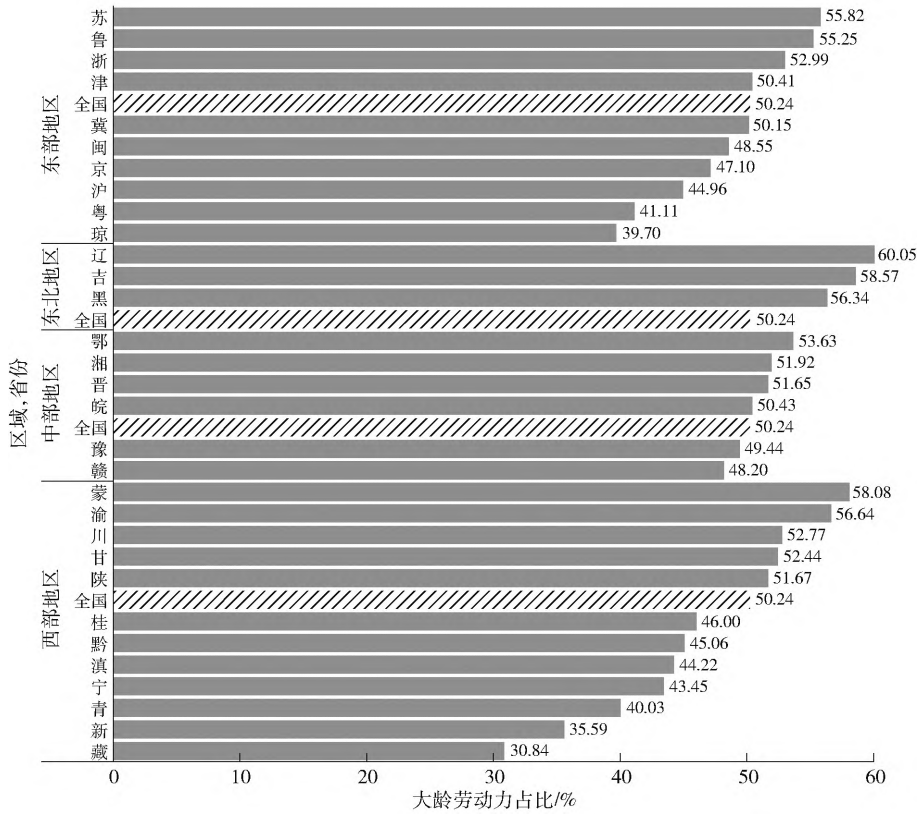


图3 2020年分区域、分省份农村劳动力老化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散,有3个省份低于40%,11个省份处于40%~50%之间,16个省份处于50%~60%之间,1个省份超出60%。经计算得出,31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偏度值为-0.73,即整体呈现出中度左偏分布,有个别值较小。低值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的广东、海南和西部地区的青海、新疆和西藏。而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则集中于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的内蒙古、重庆。另一方面,从极差来看,辽宁省的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最高,达60.0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8个百分点;西藏最低,为30.84%,低于全国近20个百分点。

二、农村地区劳动力老化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农村发展的潜在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的驱动条件

对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历时特征和区域差异的整体把握,有利于准确认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存量及变化趋势,以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参考。面对这一未

来将持续30年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年龄结构断层的客观现实,需要进一步揭示农村劳动力老化发展迅速的驱动因素和影响机理,以辩证看待其对农业经济活动和农村社会系统运行的潜在影响。研究定义的劳动力老化水平,是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中45~64岁大龄劳动力所占比值衡量。从分子、分母要素作用及其协同效应来看,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年龄选择性带来的农村大龄劳动力相对增多,以及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加剧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是农村劳动力老化发展演化的关键因素(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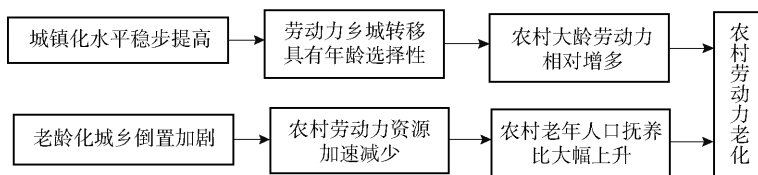


图4 影响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因素分析

从分子效应来看,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带来农村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农村大龄劳动力相对增多。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扎实推进促使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至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①。当前已进入城镇化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并突破75%的天花板,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李培林,2022)。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来看,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一直都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王放,2014)。2020年“乡—城”流动人口为2.49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6.26%,10年间提高了3.06个百分点。而农村劳动力流出是农村劳动力老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出每增长1%,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就会上升0.067%(范东君,朱有志,2012)。同时,农村流出人口对农村人口平均年龄每年增加的贡献率达16.91%,流出人口的平均年龄与农村人口平均年龄的差距变大(邹湘江,吴丹,2013)。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老化的影响在于其具有较强的年龄选择性,即流出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集中在15~30岁年龄段,20岁左右达到峰值,中年时期保持在较高水平,55岁以后逐渐下降(周皓,2023;孟向京,姜凯迪,2018)。

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年龄选择性符合出于家庭理性的微观基础和以流动就业为基本生计模式的乡村社会新形态的客观现实。一方面,从农户家庭的视角来看,出于家庭理性和实现生计最大化的目标,多数农户家庭在劳动力配置上采用代际分工的方式,即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年劳动力留守乡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一农村家庭“半耕半工”的代际互助模式构成了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老化的微

^① 2022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再上新台阶. 国家统计局网. (2023-01-17)[2023-02-13].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7/content_5737453.htm.

观基础(高鸣,2022)。另一方面,从农村劳动力流出的乡村社会新常态视角来看,伴随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生产率大幅提升,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随之减少。同时,受到农村产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农地利用结构和农户生计方式多元化转型的影响,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土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弱,青壮年劳动力的务农积极性明显下降。此外,青壮年劳动力在面对流迁行为带来的较高净收益时,因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然选择外出寻求新的发展和增收机会。这代表着当前农村社会的一种新常态,即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既是一种现实,也是新时代农村发展的大环境与客观条件,农村现代化亦需要在开放与流动的背景下推进(陆益龙,2018)。由此,以上构成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乡村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转变发生作用的影响机理,即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年龄选择性使得农村剩余大龄劳动力相对增多,在分子效应的影响下,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逐渐提升。图5进一步展示了乡村劳动力老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在省际存在相同的发展轨迹,二者整体呈现正相关关系,体现了农村地区劳动力老化现象演化加剧受到城镇化进程和劳动力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迁移选择行为的驱动力量。

从分母效应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老龄化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推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急剧减少,从而呈现出劳动力老化水平加剧的必然趋势。长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不及城镇居民,且社会支出结构明显偏向城镇的条件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更深且速度更快,同时二者差距持续扩大。2020年,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17.7%,高于城镇6.6个百分点。该值在2010—2020年间以5.7%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持续抬升,使得农村已于2019年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相比之下,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不仅低于农村,亦低于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以3.6%的年平均增长率由2010年的7.8%增长至2020年的11.1%。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表现在劳动力资源总量减少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承担的老年抚养负担加重两方面(李玉梅,童玉芬,2014)。其一,农村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严峻挑战。基于城乡发展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在农村的推力和城镇拉力的作用下,追求家庭及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至城市,同时叠加农村总和生育率由2010年的1.44快速下降到2015年的1.27且下降幅度明显超过城镇带来的影响(郭志刚,2017),使得农村各年龄组劳动力资源均呈减少趋势。据推算,未来30年农村劳动力资源规模将由2020年的3.21亿下降至2050年的1.25亿,尤其是在2030—2040年间将以3.77%的年平均下降率,年均减少842万人^①。与此相反,城镇将不会面临劳动力资源严重短缺的数量压力,虽然城乡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但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始终高于农村(李玉梅,童玉芬,2015)。其二,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幅度

^① 根据预测模型结果整理所得。

远高于城镇。2020年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8.13%，分别高于全国和城镇8.4个、12.6个百分点；2030年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高达63%，比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高出25%。未来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瘦身”，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窠窠”结构（孟向京，姜凯迪，2018）。图6再次印证了农村人口老龄化之于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的作用，31省的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相关系数达0.62，反映了二者具有较高的线性关系紧密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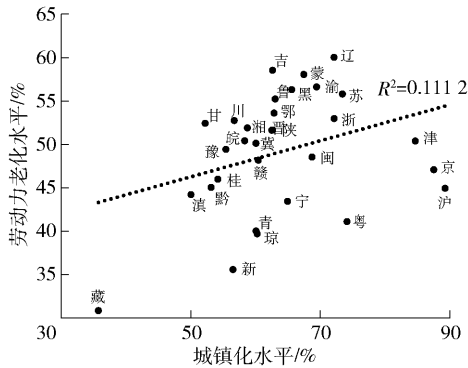


图5 2020年31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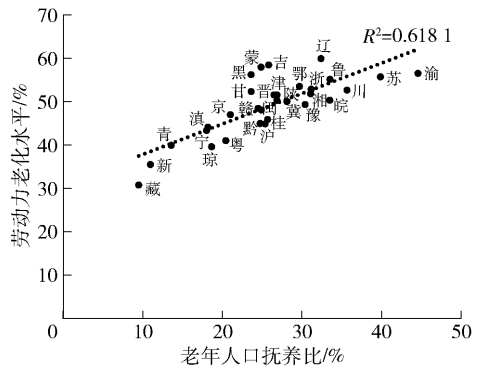


图6 2020年31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状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事实上，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女性化相伴而生（Song et al., 2009）。源于女性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滞后性，我国已出现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这一农业劳动力性别结构的非均衡现象（文华成，2014），其亦构成农村女性劳动力老化水平高于男性的直接原因。农村女性在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大潮中，受制于家务劳动的拖累、土地的掣肘和受教育水平低下，其转移人数、转移速度和转移后的就业层次均落后于农村男性（高小贤，1994）。在这种“男工女耕”的分工格局下，农村女性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时间占农户总农业生产时间的比重逐渐提升。但由于全日式的工作模式带来的低产值和农业生产的低效益，该分工格局背后隐藏着农村女性严重的就业不足和在非农就业市场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困境。同时，叠加我国女性老年人口比例长期高于男性、女性老年人的自我经济供养能力低于男性、农村75%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成员供养和劳动收入等全体人口老龄化发展宏观因素的影响（杜鹏，2023），使得农村45~64岁大龄女性劳动力占比超出男性，且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的性别差异大于城镇。

（二）劳动力老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

如前所述，农村劳动力老化既是空间上因青壮年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带来的大龄劳动力分布非均衡动态演化的过程，也是时间上受到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影响发生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渐变的过程。其背后揭示的乡村人口主

体老弱化和空心化的客观现实,将逐渐打破乡村原有的农业生产要素分配格局和乡村社会系统运转结构。而这将会深深影响乡村具有的、城市不具备但确是整个国家发展不能或缺的特有价值,即巩固农业基础、守护青山绿水、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陈锡文,2023)。其亦蕴含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乡村振兴的两个目标当中:一是实现“国之大者”,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二是达成“民之所盼”,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①。由此,针对农村劳动力老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多重影响,主要从农业经济活动和农村社会系统两方面展开(见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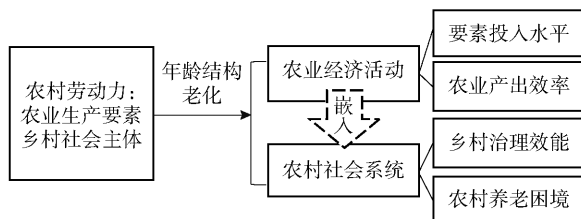


图7 劳动力老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影响

一方面,作为最具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对农业部门的产出贡献率高于非农部门(程名望等,2018),其年龄结构的演变势必引发要素投入水平和农业产出效率的变动。其中,不利影响包括“体力下降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有利影响则包括“经验积累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周来友等,2015)。具体表现为,大龄劳动力随着体力衰减和接受新技术的能力降低,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同时,其倾向于规避风险而较少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可能带来化肥、农药等其他生产要素利用的低效率。然而,不可否认,随着年龄的增加,通过在干中学不断积累耕作和管理经验,劳动力的技能娴熟程度和生产技术效率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因大龄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报酬低于青壮年劳动力,将有效降低其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和减弱因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的农业兼业现象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负效应。因此,劳动力老化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取决于四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同时亦在地域分布、土地资源条件、农业种植结构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降低了北方的粮食生产效率,但对南方没有显著影响。其原因在于北方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高于南方,随劳动力年龄的增加,老化效应可能超过积累效应,使得粮食生产的技术效率降低。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并未产生负面影响的研究结论的得出,则是源于生产决策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农户自身的人力资本以及农业劳动者的体力不再是大田农业生产的约束条件(胡雪枝,钟甫宁,2012;彭代彦,文乐,2016)。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3-02-13)[2023-02-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

图8展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对区域性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反映各地区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人均粮食占有量反映地区粮食供给状况^①。首先,在农村经济占地区经济比重处于前10位的省份中,有6个省份的农村大龄劳动力占比低于全国50.24%的平均水平,海南和新疆两个省份甚至未达到40%这一劳动力老化水平的临界值。其次,在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超出全国均值的18个省份中,有14个省份的粮食人均产量超过了400公斤这一粮食安全线。由此可见,当前在农村劳动力老化势头发展迅猛的省份,整体并未出现严峻的区域性粮食安全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老龄化对区域性粮食安全的影响仍较为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龄劳动力的生产保守性恰好成为粮食生产的天然稳定器,该群体倾向于选择操作简单、节约资金、技术要求低的传统农作物,客观上抑制了土地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冲动。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转移时以“送给”亲戚邻居免费耕种的方式保持收回土地的灵活性,使得区域内粮食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根本性破坏,仍能维系与农户间的粮食供求平衡关系(郭晓鸣等,2014)。因此,对于劳动力老化对农村经济活动产生的长期影响问题不必太过悲观。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的进步,已逐渐松弛人力资本对农业的约束,需要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等不断为松弛约束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和乡村振兴的最大利益需求者,坚守在农村的劳动力人口维持着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价值延续,其年龄结构的变动既关系到能否有效发挥农民在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中的自主性活力,亦紧密联结着如何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的特殊困境。如图7所示,农村劳动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经优化组合后投入生产、经营和运行,形成一种现实的生产能力,进而影响到农业经济效益。然而,农业经济活动并非脱嵌于农村社会的独立经济部门,而是承担着农村社会系统运行的综合功能。

首先,乡村“治理有效”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保障因素,提高乡村治理效能依赖专业性、综合性的农村管理人才和农村人口的广泛性参与。农村劳动力是乡村空间生存的最大主体,处于15~64岁年龄阶段的村干部与村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互动中积淀了一套习惯规则,共同构成村庄治理单元内熟识度和信任度最高的内生型群体。不过,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农村人才施加巨大的外拉作用和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缺失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并未形成有效的人才吸引与长期培养机制(茆长宝,熊化忠,2019)。同时,乡村干部存在年龄结构老化、学历偏低和思想保守等问题,使得动员

^① 人均粮食占有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粮食供给状况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认为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0公斤以上就代表该国或地区粮食安全。农业发展成就显著乡村美丽宜居——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二。国家统计局网。(2022-09-14)[2023-02-13]. 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209/t02220914_188822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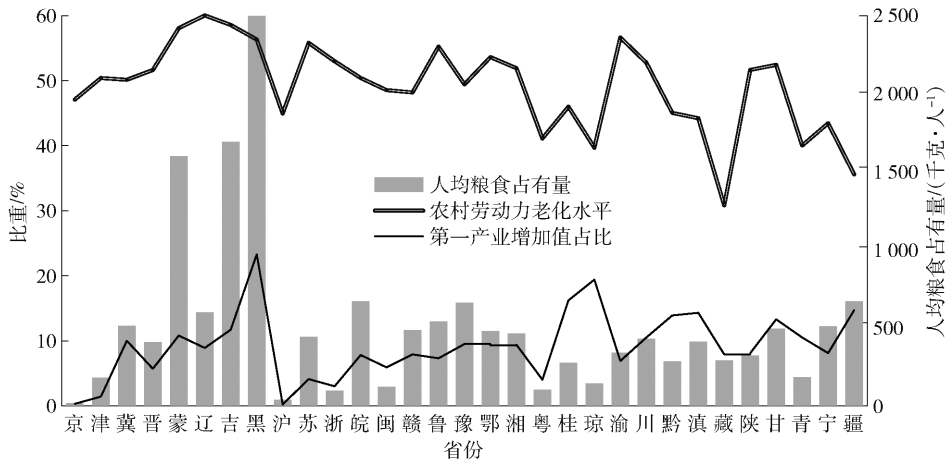


图8 31个省份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计算。

与整合乡村治理各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提高留守人口政治参与度的能力不足,削弱了村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意识和村庄共同体意识的培养(高卫星,张慧远,2021)。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农村基层状况统计资料显示,村民委员会数量以1.54%的年平均下降速度,由2010年的59.47万个下降至2020年的50.91万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21),平均每年约减少8554个村民委员会。这体现了对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精简村级工作机制的贯彻落实,促进公共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进一步深化基层减负成果。但同时村民委员会具有的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办理村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职能发挥受到一定的限制,将不同程度削弱村庄的组织化程度。由此,在基层组织活力减退的背景下,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村庄治理参与主体,其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将逐渐减低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率,陷入对公共事务不了解、不关心的状态,动摇村庄原有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秩序。

其次,农村劳动力人口既是农村全面发展的承担主体,也是农村家庭养老的责任主体,劳动力老化将造成农村养老责任主体的供需缺口日渐显现(穆光宗等,2013)。其直接影响表现为,具有大龄劳动力和低龄老年人口双重身份的60~64岁群体的规模及占比加速上升。2020年,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5.83%,其中60~64岁群体规模达到7338万人,且42.2%的人口分布在农村,有近七成在业老年人仍以务农为主。关于如何看待农村低龄老年人以在家务农为主开展“无休止的劳动”这一现象,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积极践行生产性老龄化的具体表现,农村老年人利用承包地、庭院内的土地开展农作物生产,以满足自家的消费需求,对配置其闲暇时间、提高食物消费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应鼓励老年人继续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高鸣,2022; Fan et al., 201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在青壮年

劳动力离土离乡打破了乡村传统的代际同村居住模式,以及远距离空间分布阻碍了养老承担主体实现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功能的趋势下,农村老年人陷入无人照料的尴尬境地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同时,受到农村养老服务投入明显不足、养老基础设施落后、养老服务多元主体体制尚未形成的影响,老年人只能展开“自我维持型”的养老模式(陆杰华等,2021;王瑜,程令伟,2023)。后面一种观点是站在城乡关系变迁视角来审视农村养老困境,即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内嵌于城乡关系变化之中的结构性问题。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依然是乡城流动大军主力的模式下,家庭养老责任主体的供给出现了明显断裂,弱化了家庭养老功能和村社传统,难以满足大龄劳动力急剧上升的养老需求。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老化过程中性别失衡凸显,亦对如何应对老年女性的贫困脆弱性和合理开发女性老年人力资源提出了挑战。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应对劳动力老化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稳步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对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但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以及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①。这一潜力体现在优化配置乡村人力资本层面则对应着:青壮年人口外出转移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以流动就业为基本生计模式为乡村的形态和结构增添了新的特质,反映了农村社会潜在生命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而大龄劳动力等农村留守人群坚守在农村并维持着乡村生活的价值延续,才能使农村社会仍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特征,促进乡村在现代化背景下获得新发展以保持乡村主体性。在农村各种可流动资源要素加速向城镇聚集的基本趋向下,如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增进农民福祉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合理关切,亦是衡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这就需要在继续帮助农业人口适度转移就业,并着力提高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转移后对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和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积极性问题的探索。在此指导思想的转变下,正确把握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转变的历时特征和空间差异态势,研判青壮年劳动力作为农村人力资源后备主体的转移流出直接驱动农村劳动力老化这一现象,对农业经济活动和乡村社会系统产生的多重影响,是对“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

^①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8-09-26)[2023-02-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9/26/content_5325534.htm.

开发放在首要位置”^①和“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②等要求的有效落实。由此,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老化状况及发展趋势的具体特点和对我农业农村发展各层面的潜在影响,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有效应对农村劳动力老化的路径选择。

第一,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加快推动中心城区与乡村的互联互通建设,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重点引导劳动力在城乡、区域、产业间有序流动,推动地区间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优势互补。同时,加大对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的供给力度,以解决城乡空间权利表现在城乡居民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平衡矛盾。明确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幅度提高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及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建立完善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全方位改善农民生活品质,缩小城乡消费和生活水平差距,以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和全面增进农民福祉。

第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为松弛人力资本约束创造条件。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类型正向节约劳动型转变,对于削弱劳动力老化对农业产出效率的负向影响具有较大潜力。农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对劳动者体力投入需求减少的现实,有赖于在正视小农在农业中的主体性特征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创新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将现有的农业生产非正式集体决策制度化,以适应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同时完善农机补贴,开发适合老年人操作的家用农机;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展病虫害防治、代耕代种等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并扶持农产品直播直销新业态。

第三,提升农民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提高乡村治理效能。针对劳动力老化带来的管理与技术人才缺失和村庄原有的治理结构受到动摇的困境,一方面,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注重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科学设置培训内容、提升种植户操作技能,以培养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同时,密切结合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充实农民数字生活价值内涵。这既满足了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对及时抓取市场信息和进行数字化营销以积极引领现代农业新发展方向的需求,亦极大减少了大龄劳动力对使用未知的数字化“新农具”的顾虑,也提高了对生产全过程信息化的新业态模式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强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1-02-23) [2023-02-25].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2/23/content_5588496.htm.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网. (2023-02-13) [2023-02-13]. 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

化县乡村三级治理体系功能,压实县级责任,推动乡镇扩权赋能,夯实村级基础;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完善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治理方式;通过技能培训、社区建设、示范引导等方式培育农民的乡村公共意识,发挥农村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第四,打造高质量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完善扶助农村女性老年人的政策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正常调节机制和养老保险缴费政府补贴制度;建立农村地区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优先满足失能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重点解决农村老年群体在上门医疗、老年送餐、健康救助等方面的迫切需求,扩大适老产品的供给力度,以应对劳动力老化造成的养老责任主体供需缺口逐渐扩大的困境。鉴于农村劳动力老化的性别失衡状况,应在老龄公共政策中从老年人家庭赡养、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面对农村女性老年人有所倾斜。同时,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这一特殊养老困境上的作用,根据本村庄内的劳动力老化水平及老年群体性别结构差异,通过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村内养老、医疗等公益事业的投入规模和为女性老年人提供可靠的养老保障。

第五,针对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口进行精准化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达成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效率和积极应对劳动力老化二者的平衡。面对农村劳动力老化水平和提升速度均超过城镇的客观现实,需要通过充分发挥土地这一对农村老龄人口而言最重要的资源的作用,来实现其具有的经济保障功能、家庭与社会的维护功能以及身心与健康的支持功能。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需要针对老年群体需求的差异性提供精准化的应对措施,例如承包地制度在应对低龄、中龄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时,既要严格保护好其承包权和经营权,又要防范违背其意愿的经营权流转,以更好地实现“以地自养”。而面对高龄老人,则需要建立和完善承包地退出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机制(唐浩,张聪,2022)。

[参考文献]

- 陈锡文,2023.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1):3-4
- 程名望,贾晓佳,俞宁,2018.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1978—2015年):模型与实证.管理世界(10):161-172
- 杜鹏,2023.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31-47
- 范东君,朱有志,2012.农村劳动力流出对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影响探究.西北人口(3):104-109
- 高鸣,2022.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关键影响、应对策略和政策构建.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8-21
- 高卫星,张慧远,2021.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中州学刊(2):7-12
- 高小贤,1994.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社会学研究(2):83-90
- 郭晓鸣,任永昌,廖祖君,等,2014.农业大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态势、影响及应对——基于

四川省 501 个农户的调查. 财经科学(4):128-140

郭远智,周扬,韩越,2019.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地理研究(3):667-683

郭志刚,2017. 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 中国人口科学(4):2-14

胡雪枝,钟甫宁,2012.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7):29-39

李培林,2022. 面对未来:我国城镇化的特征、挑战和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8):5-20

李玉梅,童玉芬,201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对比研究——兼论城乡劳动力流迁及其影响.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78-86

李玉梅,童玉芬,2015.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资源变动趋势模拟研究. 人口与发展(2):14-22

廖柳文,高晓路,2018. 人口老龄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5):617-626

刘二鹏,张奇林,2019. 农村失能老人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基于 CLHLS(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保障研究(2):49-58

陆杰华,郭芳慈,陈继华,等,2021. 新时代农村养老制度设计:历史脉络、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13-122

陆杰华,韦晓丹,2022. 劳动力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及其战略应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3):18-30

陆益龙,2018.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48-56

茆长宝,熊化忠,2019.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口两化问题与风险前瞻.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8):57-63

孟向京,姜凯迪,2018. 城镇化和乡城转移对未来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人口研究(2):39-53

穆光宗,茆长宝,吴金晶,等,2013. 乡土中国的人口弱化和优化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61-71

彭代彦,文乐,2016.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降低了粮食生产效率吗——基于随机前沿的南北方比较分析. 农业技术经济(2):32-44

唐浩,张聪,2022. 土地制度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挑战与思路.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34-44

王放,2014. “五普”至“六普”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 人口与发展(5):16-24

王瑜,程令伟,2023. 城乡关系变迁与农村养老的社会建设[OL].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

文华成,2014. 中国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成因与影响——基于历史宏观截面数据的验证. 人口学刊(4):64-73

谢玲红,2021. “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展望、结构预测和对策思路. 农业经济问题(3):28-39

叶兴庆,2018.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 改革(1):65-73

张强,张怀超,刘占芳,2018. 乡村振兴: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战略选择. 经济与管理(1):6-11

周皓,2023. 我国流动人口年龄别流动率模式及其演变.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85-201

周来友,仇童伟,周冬,等,2015.丘陵山区劳动力老龄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识别.中国土地科学(10):35-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21.2021中国农业农村统计摘要.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邹湘江,吴丹,2013.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分析.人口学刊(4):70-79

Fan,Liangxin,Xiaohu Dang,Yan Tong,et al.,2019.Functions,motives and barriers of homestead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rural areas in ageing China.Journal of Rural Studies(67):12-24

Song,Yiching,Linxu Zhang,Dajiang Sun,et al.,2009.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rapid changing rural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 and alternatives for an equitable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AO-IFAD-IFAD-ILOW Workshop on Gaps,trends and current research in gender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mployment:differentiated pathways out of poverty,Rome

Aging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Mechanism Analysis, and Response Paths

LU Jiehua GUO Rongrong

Abstract As the most dynamic factor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largest demander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is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absolute level and relative growth rate of the aging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s. In the next thirty years, the supply of rural labor force will continue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age structure fault, and the aging level of the labor force will always exceed the critical value of 40%.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process of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i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regional and provincial differences.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aging level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is due to the relative increase of the elder rural labor force brought by the age-selective rural-urban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and the sharp rise of the dependency ratio of the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nsified urban-rural inversion of aging, which will gradually change the origin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It will inevitabl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rural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aging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ural human capital and unleash the initiative of rural social entities.

Keywords Aging of the labor forc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human capital